

意犹未尽

我的爷爷

曹润聪文

爷爷走了半年多,一直想写他老人家。

动笔难。我总觉得爷爷仍然好,没病没灾;等过年了,我们还能一回去看他。

那时,我做了爸爸,孩子小,要一直带。我妈照顾爷爷中间来过一次,告诉我爷爷病了,乐观能活半年一年。

爷爷一九二一年生,到去年九十三,是长寿。他也乐得夸耀,以前单位九十岁上就剩四个了。我说,那可是四大金刚。爷爷说,在老家他辈分最高年纪最大,年轻后辈上来磕头都叫老祖宗。

爷爷,其实是外公。我从小把外公外婆叫惯了爷爷奶奶。奶奶比爷爷早走十年。以前我总爱说去奶奶家,一时没改口。我妈便提醒我说奶奶不在了。

常年在外上学上班生活,去爷爷家越来越少。后来都是爷爷过来看我们。我问爷爷,你喝多少。爷爷说,一点点就够了,上次多了头晕。

我爸在旁边劝,再给你爷爷倒一点。

饭后,洗漱完毕等看百家讲坛,电视声音开得响,我妈说他,天天这样,老了耳朵背。我记得奶奶以前也爱说爷爷,平时叫他拿东西听不见,讲他旁的什么都能听见。

好像老人都这样。

耳不聪目也不明。爷爷白内障后来干脆要看不见了。手术后恢复得很好。他有一副眼镜,看电视才用。爷爷说,这一副才几块钱。奶奶活着的时候说爷爷总喜欢买便宜货,被人坑。有一次低价买回来的皮带,结果里面是纸板。奶奶比爷爷小十岁,不识字却精明强势。奶奶走后,我妈接过话头,常念叨。

二零零三年十月,奶奶走了,我奔丧回家。做了梦,奶奶嘱咐我好好照顾爷爷,他能活到九十九。我转述给我妈。她说奶奶就疼你,她都没被托梦过。

我印象中,爷爷身体一直好,除了常年胆囊炎,不爱吃药偶尔复发要吊瓶外,没有大毛病。我妈说,你爷爷翠,吃药自作主张。

爷爷腿脚好,爱走路。他说一天要走十里。我没弄清华里怎么算,但是有一年五一还是十一,爷爷对我讲,带你去给奶奶上坟,“我们走去,回来可以坐一段车”。去程一个多小时。

我一直坚信爷爷能长寿,爷爷自己也坚信。爷爷的病是摔跤后的并发症。马年春节,我见到他,依然精神好,但是走道脚步迟缓。我看着爷爷远远走来,对我妈说,爷爷老了,走路不像以前那么有劲了。我妈说,能不老么,毕竟九十岁的人了。

零五年,我到上海上学,爷爷来送我。在陆家嘴看外滩,天刚下过雨,有一处水洼,老头嗖一下就跨过去了。



筑巢 ■苏春生

杨浦记忆

新村里的那些往事:50号屋山头

朱建新文

小时候,50号屋山头(西山墙)是我们这一带小八腊子最喜欢去的地方。

这里紧挨着一条浅灰色的水泥方格路,路的另一边就是偌大的新村花园。沿着笔直的水泥方格路,一排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。常与花园里随处可见的石榴树、紫荆花、夹竹桃遥相呼应,美不胜收。

小时候,我们常在这条水泥方格路上,一起玩“造房子”的游戏。

屋山头场地开阔,四通八达,最适合小八腊子们做游戏了。课余时间,白天,男孩们在这里打弹子、刮四角片、斗鸡、补洞、打铃角……女孩们则喜欢在此跳橡皮筋、踢毽子、跳绳……晚上,这里就更热闹了。那时候,每当50号屋山头那片橙黄色的灯光亮起时,就预示着孩子们心目中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就要来临了。

晚饭后,孩子们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。男孩、女孩、男同学、女同学、小孩子、大孩子,不分彼此,大家心里都想着同一件事——一起做游戏。那时候,没有电脑和手机,外出做游戏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。

这里玩得最多、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,莫过于捉迷藏和木头人了。这些游戏让人既兴奋又紧张。夜晚,大家在一起玩捉迷藏和木头人的游戏,不分彼此,打破了在学校里男女同学之间的那种界限。那时候,在课堂上男女基本都是同桌,很多同学都在课桌上划分三八线,谁也不许逾越,彼此也很少在一起交谈。这种现象其实在一、二年级时还很少见,越到高年级越盛行。

那样的夜晚,夜色朦胧,灯火阑珊,在50号的屋山头处、在新村花园的草坪上、在浓荫蔽日的河边柳树下、在高低不平的弹格路上……到处都有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的身影和欢声笑语。

这样的夜晚,是孩子们的世界,无忧无虑,尽情地在外面一起玩耍,像小鸟一样快乐,没有家长在身边跟着和操心,也许只有在我们那个年代才能拥有。

其实,50号屋山头还有许多让人难忘的事。

学龄前儿童的那个阶段,居委会那些热心的大妈还会带来大头娃娃的面具,让大姐姐(其实也就是二、三年级的女孩子)带我们一起玩大头娃娃的游戏,或者像找呀、找呀、

找呀找,找到一个好朋友之类的游戏,还会教我们唱一些儿童歌曲。

暑假里,课外学习小组有时也会来借用一下这里的风水宝地。整个上午,50号屋山头那块背着阳光的阴影里凉风徐徐,大伙儿把方凳、板凳全搬到这里,做暑假作业没有比这里更舒适的了。

夏天,黄昏之际,这里早就会有人来占位,那些爱下象棋的、打桥牌的、玩扑克牌的大人,也包括我们这些喜欢走军棋、玩飞行棋、走跳棋的小八腊子,都会到这里来占一席。屋山头的路灯下,是夜晚不多的通宵照明之地。这里常常人满为患,可谓天时地利,热闹非凡。

昏暗的路灯下,沿着屋山头的墙脚边,有时也会钻出几只爱凑热闹的二尾子蟋蟀。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孩子大显身手的机会了。捕捉蟋蟀的过程中,偶尔也会遇上蜈蚣、百脚之类的不速之客,稍加注意,也并无大碍。有时,这里也会飞来一二只巴掌大的淡绿色蛾子,引发一阵子骚动,不一会儿,又恢复如常了。

三年困难期间,填饱肚子,解决吃喝成了当时的第一需求,这里被邻近的居民们开辟成蔬菜种植地,也算是件不得已的事。

世相百态

孙女的挂历

张九铃文

“爷爷,这是我的挂历。”在幼儿园上大班的孙女拿着印有她自己照片的挂历,额上冒着热气,刚到家忙告知我。

我即拿起她的挂历翻看,是双月挂历,里面全都是孙女照片,有她戴着小红帽做着“鬼脸”的照片,有她穿着黄色衣服“跳舞”的照片,还有她右手做着“胜利”手势的照片等。

印刷精美,油墨馨香。此时此刻,我想到自己当年曾在印刷厂工作四十多年的情景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进入坐落于杨浦区平凉路福祿街上的市印刷二厂工作。由于正值年底,整个工厂从照相、制版、晒版、印刷、拣剔、切纸、打包等工序,都在忙碌于印刷各种挂历、各种年历片和各种对联的任务。那个年代,从挂历到年历片再到对联,相对讲都较突出政治色彩和时代感。挂历主要是风景、绘画、样板戏等。年历片则是娃娃、动物等系列印刷品,并时有烫金或凹凸版的各种类型的年历片。

七十年代初期还属计划经济,物资匮乏,经济落后。我在印刷厂工作的消息被同学和邻居们知道后,只要到年底,他们都会来我家向我讨要挂历或年历片,当时我也为成了香饽饽而自豪。

那时挂历和年历片在社会上都吃香,手拿挂历或年历片走在马路上,时常还会有人走到你面前,要求你打开看看以饱眼福,甚至还能用挂历或年历片交换票证。

由此想起,当年的电影票也属紧张票据,一般来说:电影票的分发都是单位宣传部门的干部到电影院领取,然后再分发到各个部门和班组,根据登记时间分发或抓阄的方式索取。记得,那时《战上海》这个电影“重新”上映,我们单位没有电影票的计划。我为了看到该部电影,手拿一套六张《娃娃》的年历片,在平凉路上的沪东电影院门口欲与他人交换。当时电影院门口人流熙熙攘攘,而我心急如焚,终于等来机会与一位男士交换成后,速往里跑。此时,离电影开场仅二分钟时间,电影院里灯光已关闭,在黑暗中找到了自己的座位,心里别说有多开心。看完后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像一个孩子似的得到了极大满足,把每个场景都印在脑中。

“爷爷,我的挂历。”晚饭时,孙女拉我到她的房间,指着已悬挂在大橱边的挂历对我奶声奶气地说:“我抱起孙女,指着挂历对她讲:‘爷爷看到了,这是你的童年,多么幸福,多么欢乐呀。’现在的孩子,赶上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好时代,真为你们而高兴啊!”

诗抒胸臆

端午问朱师疾

冯如

翠帷新墨映晴阳,
庄蝶迷时笺自香。
漫说安康值佳节,
牵思苦病困皮囊。
论交倾盖钦德范,
有鹤还庭愁药王。
且摘旧章聊寄与,
惠风知我意难当。

书山有径

心中的阿勒泰

林希文

打开作家李娟的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之前,我先从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获得了阿勒泰的最初印象:天空明静,草原辽阔,有山丘、森林,戈壁、雪山,再加上哈萨克民族浪漫的游牧生活,帐篷点点,牛羊成群。一个字:美!美得让人恨不得马上整理行装,飞到那远在新疆的桃花源里。

然而,当我开始阅读这本散文集时,却发现作家详细描写了在阿勒泰生活的种种艰辛:交通不便,晕车晕得天旋地转;经常迁徙,简易的帐篷漏雨漏得稀里哗啦;哪怕就是取水,也要走很远的路提着水桶过独木桥……哦,想象和现实是那样的不同。

这感觉就像我当年在山区第一次去河边洗衣服时,端着一脸盆衣服边往河边边走边哼着“洗衣歌”,结果到

了河边才发现腿也蹲不住,腰也弯不下,不一会儿就腿疼腰酸,只想快快逃离,一点儿也浪漫不起来。

是什么样的作家才能在如此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写出如此美好的文字?

再读《我的阿勒泰》,发现作家不仅描写了阿勒泰的景色美,更细致记录了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原生态的风土人情、生活习俗。从中,我们可以看到阿勒泰人的善良,如《古贝》一文中为她河中解困、又帮她提水的古贝姑娘,《喀吾图的永远之处》一文中为了消除“拿走裤子不付钱”这个误会,而走了近十公里雪路的十一二岁男孩。作家还描写了阿勒泰人在恶劣

的气候环境中求生存的韧劲,这种韧劲体现在作者身上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乐观。她用真诚的目光观察真实的生活,用敏锐的目光捕捉生活中的美,再用温暖的文字把这种美展现出来,“去爱,去生活,去受伤”。

生活中有鲜花有荆棘,难得的是看清现实苦难后的顽强。如果我也能有作家李娟这般真诚、敏锐的目光,和顽强坚韧的生存态度,就不会在青山绿水的河边萌生出快快逃离的念头,而是静下心来,在粗粝的日常中发现浪漫和美好。那样,我或许便也有了“记忆中最美好最闪光的时刻”,“阿勒泰”便不在远方,而在心底了。